

2021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春之鬧參與心得回饋

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一邱邵品

在參加春之鬧之前，我從未接受過正式、完整的質性研究方法訓練，雖深受社會學質性研究的吸引，但卻對於方法一知半解，並在自己的實作中充滿著困惑。然而，春之鬧以「牽手做中學」為主題，讓我首次感覺到了自己在這條且戰且走的質性研究之路上並不孤單。通過老師們安排的課程主題以及同學們在課後做出的提問和討論，一種在手冊裡的說文解字中並未明白提及的「鬧」之意涵呼之欲出，在我看來，這個「鬧」還來自了社會學質性研究學徒們內心的不平靜與躁動不安。

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提問為例。記得活動進行到了第三天，在某一場實作討論的後續提問中有人問道「如果田野過程中不能錄音怎麼辦？」當時提問者所指的不能錄音，並不是單純的報導人不願意給錄音的情況，而更是意指在進行田野的過程中，發生了關鍵的事件，報導人說出了關鍵的話的當下，研究者不能馬上打開錄音筆那該怎麼辦？難道要請他再說一次嗎？一連串的討論下來，我感覺到一種焦慮使得錄音筆成為一個被強烈依賴的工具，而所有能被當作貼合研究主題的「證據」都必須要被錄音筆記錄下來，確保這些田野裡遇到的話語都可以被確實的收進口袋，如此一來才能避免自身被質疑，彷彿唯有這麼做生產出來的才是可供檢驗的真實。

但社會學知識的生產真的是這樣的嗎？是什麼樣的焦慮使得類似的提問不斷地在這次的工作坊中出現？我認為，或許參加工作坊的我們，都在經驗著身為社會學徒的精神分裂。社會學質性研究的學徒一方面要做田野，另一方面又被要求要科學化且可供檢驗；一方面著迷於質性研究田野中遇到的千奇百怪，另一方面卻又擺脫不了對量化研究方法的惴惴不安。於是，焦慮油然而生，對研究方法的渴求成了舒緩焦慮的一種展現，不斷和量化研究進行比較、切割也暗暗地透露出了一種自卑。「如此一來的質性研究，會不會反而生產出四不像？」是我在工作坊結束後最大的困惑，工作坊確實提供了我們非常多方法上的教學，但卻隱隱

約約的像是再現了我們的焦慮，將科學研究的規和矩更為清晰的劃了出來。雖說無規矩不能成方圓，但就我的觀察，參加的大家與其說是不懂規矩，更多時候是太在意規矩了。到底社會科學的質性研究彈性有多大？身為一名「學生」在方法上、寫作上能怎麼做出自己的巧思和嘗試？似乎都是參加完工作坊後仍較難獲得回應的問題，但這些問題卻又關乎著在這場精神分裂裡的我們該怎麼拾回自信。春之鬧的「鬧」之意涵，如何能從質性研究學徒為科學方法、量化研究所困的「鬧」心之鬧，轉化為更勇於嘗試、想像獨具一格方法的活潑熱「鬧」之鬧，我想是下次以質性研究為主題時可以規劃加入的方向，也將會是參加完這屆春之鬧、獲得質性研究方法基礎後的我要繼續做的功課。